

言文
中国

京城四大名醫

徐怀谦 李四平 / 著



當代中國出版社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京城四大 $\frac{1}{2}$ 医

——



K826.2/8

2007



京城四大 名 医

徐怀谦 李四平 / 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京城四大名医/徐怀谦, 李四平著. —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7.6

(百年文化中国)

ISBN 978-7-80170-606-5

I. 京… II. ①徐…②李… III. ①萧龙友 (1870~1960) — 生平事迹②孔伯华 (1884~1955) — 生平事迹③施今墨 (1881~1969) — 生平事迹④汪逢春 (1884~1948) — 生平事迹 IV. K82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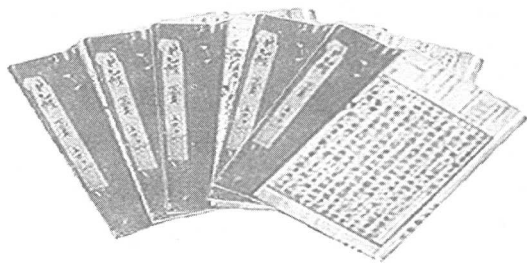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75956 号

出 版 人 周五一
责任编辑 王树清
责任校对 王小芸
装帧设计 耀午书装
出版发行 当代中国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 8 号
网 址 <http://www.ddzg.net> 邮箱: ddzgcbs@sina.com
邮政编码 100009
编 辑 部 (010)66572152 66572154 66572155
市 场 部 (010)66572157 66572281 66111785
印 刷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开 本 640×960 毫米 1/16
印 张 13 印张 2 插页 161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2.00 元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010)66572159

京城四大名医

目录



001 京华名医之首萧龙友

不愿为良相，但愿为良医 / 002

为袁世凯、孙中山诊病，声名大振 / 005

“不重中医国必危” / 011

无门户之见，取彼之长、补己之短 / 015

从“息翁”到“不息翁” / 022

主要学术思想和辨证论治 / 026

养生与医德 / 036

医学之外的萧龙友 / 039

044 施今墨声名誉满京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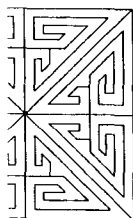
奔走四方矢志学中医 / 045

行医京城，借张宗昌巧惩“南霸天” / 053

创立北平国医学院，倾力辅助后学 / 059

探求新路，对顽疾的独特治法 / 074

欣逢盛世，献出十大处方 / 084



名医“石膏孔”——孔伯华 100

家学渊源：祖父引他走上从医路 / 100

任职外城官医院医官，奔走于防疫一线 / 103

悬壶应诊，抗议取缔中医案 / 107

创办北平国医学院 / 112

名医神技，妙手回春 / 116

毛泽东说“中医是个好项目” / 122

勤于著述，直至去世 / 128

大医精诚 医德垂世 / 130

擅治温热病与“石膏孔” / 132

熟悟经旨不泥于古 / 136

医学之外的孔伯华 / 145

对孔伯华的纪念和他的医学传承 / 147

佛心济世汪逢春 152

拜中医名家艾步蟾为师 / 152

仁术济世，慈心不忘贫苦病人 / 159

融传统文化于医学，名列“四大名医” / 166

因医得缘收授义子 / 173

汪逢春医寓的“民主课堂” / 177

主政《北京医药月刊》，流通新旧学识 / 188

在传道授业中坐化升天 / 195

附：参考书目及文章 200

从四大名医的医德说起（代后记） 2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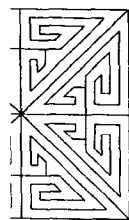
京华名医之首萧龙友

萧龙友（1870~1960），本名方骏，字龙友，别号“息翁”，解放后改号为“不息翁”。祖籍四川省三台县人，1870年2月13日（农历正月十四）出生于四川雅安，1960年10月21日，在北京中央人民医院去世，享年九十岁。

萧龙友为前清拔贡，精通文史，医文并茂，自学成医。一生精研历代中医书籍，理论联系实际，临床经验极为丰富，疗效甚高。萧龙友医名甚隆，既与施今墨、孔伯华、汪逢春三人被合称为“京城四大名医”，又有“北方萧龙友，南方陆渊雷”之称。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第一、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央文史馆馆员，中国科学院生物地学部委员，卫生部中医研究院学术委员、名誉院长，中华医学会副会长，中



◎ 萧龙友先生（1870~1960）



央人民医院顾问等职。

不愿为良相，但愿为良医

萧龙友出生在一个官宦人家，父亲萧端澍为清光绪戊子（1888年）举人，曾先后任武昌、大冶两县知县。萧龙友出生的时候，正值洪杨革命之后、帝国主义竞相侵略、欧西新学输入萌芽之时。当时士大夫阶级仍以科举考试为生路。作为长子，萧龙友自幼承父严教，每天诵习诗书，直至深夜，既能熟读四书五经、诗赋帖括，同时也受到了严格的书法训练。每当家中来客人时，作为待客之礼，萧端澍常令他当着客人的面背诵诗赋。这些训练，使萧龙友从小就对中国的历史、文学、语言知识等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弱冠之后，萧龙友赴成都人尊经书院读词章科，考试每获第一。此时他开始博览群书，同时也涉猎了很多的中医书籍。学习当中，古文水平不断提高，中医理论知识不断丰富，这为他以后自学中医打下了扎实的基本功。

萧龙友 27 岁时（1897 年），考中丁酉科拔贡，遂即入京充任八旗教习。其时正值义和团起义，八国联军攻破北京，萧龙友饱经忧患，曾被迫给洋人背粮，又曾在琉璃厂卖字为生。事后萧龙友分发山东，先后任淄川、济阳两县知县。到山东后正值变法维新之始，行新政，废科举，省会设立高等学堂。萧龙友为之制订章程，兼充教习。任知县时，他以办教案与外国神父作斗争而深得民心。辛亥革命后，移居济南任闲职，还曾在大明湖畔留下过碑文。

1914 年，萧龙友奉调入京，历任财政、农商两部秘书及府院参事，农商部有奖实业债券局总办等职，并由执政府内务部聘为顾问。已故山东文史馆馆员左次修曾在 1948 年做诗一首送萧龙友，诗名为《赠萧龙友》，其中说：“公登大耋我成髯，回首珍泉卅一年。司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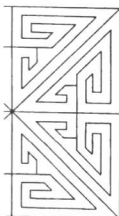
高文宣寿世，元龙硕望鄙求田。今同良相生人万，昔为司财用士千。春雨杏林花正好，蜀山西望在云烟。”诗中“回首珍泉”是指济南珍珠泉，“今同良相生人万”自然是不愿为良相，愿为良医的意思，“昔为司财用士千”是指萧龙友曾在财政部、农商部工作。这首诗所描述的情况和萧龙友在山东和北京两地的仕途生活是相吻合的。

萧龙友走上从医之路，既无家传又无师承。只是由于他童年时母亲多病，便留心于医药，经常到族人所开设的药铺去请教，对每味药的品种、形态、真伪、炮制、功效等都仔细询问，对中医知识有了初步了解，以后在书院读经史之暇也阅览方书。在读老子及诸子学说中，他受到一定的启发，因而悟及岐黄之奥妙，加深了他对中医基础理论的信任及兴趣，进而认真反复地学习研究内经、难经等医学经典。后来因母亲患了“血崩”之病，久治不愈，促使萧龙友更加努力学习历代诸医家名著，并且略有心得。

1892年，川中霍乱流行，省会成都日死八千人，街头一片凄凉，棺木销售一空。很多医生因惧怕传染，不敢医治。而萧龙友不顾危险，陪同陈蕴生沿街巡视，用中草药进行救治，使很多病人转危为安，人称“万家生佛”。经此一事，萧龙友声誉鹊起。

萧龙友进入仕途后，虽在官场，却从未间断研究医学。他的视野很开阔，不仅精研中国的医学经典，而且浏览了当时翻译过来的很多西医书籍，在公余之暇经常给人看病行医，颇有疗效。所以当时的内务部及主管卫生机关即聘请萧龙友为考试中医士襄校委员，并因而取得了医师资格。又因为他数十年宦海浮沉，自感于国于民无益，更加深了他从医的决心。1928年，民国政府南迁后，萧龙友毅然弃官行医，正式开业，自署为“医隐”，号为“息园”，曾撰《息园医隐记》一文刻于扇骨，以述其志。文章全文如下：

人必无所显而后得隐。余显乎哉？余志在医国，浮沉宦海，



数十年于国事毫无济，即以名位论，不过一中大夫耳。况当叔季之世，并此亦不能得邪？四顾茫茫，行藏莫测，内人告余曰：子非深于医者邪？既不能显达，出所学以医国，何不隐居行其术以医人。倘能合彼就此，我闻医亦大夫也。医虽小道，亦自利利他之道也。如果是，吾将与子偕隐约而终老。”余曰：“诺。”乃卷藏退密而业大夫之业，因自署为“医隐”焉。是为记。时在壬子之冬（一九一二年），越十七年己巳（一九二九年）刻于扇骨。



◎ 萧龙友书法

这段文字反映了萧龙友对医为“自利利他之道”的深刻理解，反映了他悲天悯人、治病救人的人文情怀和远大抱负。

他之所以弃官从医，与中国古代“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传统影响有一定的关系。

据宋人吴曾的《能改斋漫录》卷十三《文正公愿为良医》记载：宋代名儒范仲淹，有一次到祠堂求签，问以后能否当宰相，签词表明不可以。他又求了一签，祈祷说：“如果不能当宰相，愿意当良医”，结果还是不行。于是他长叹说：“不能为百姓谋利造福，不是大丈夫一生该做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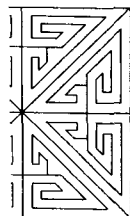
后来，有人问他：“大丈夫立志当宰相，是理所当然的，您为什么又祈愿当良医呢？这是不是有一点太卑微了？”范仲淹回答说：“怎么会呢？古人说，‘常善用人，故无弃人，常善用物，故无弃物’。有才学的大丈夫，固然期望能辅佐明君治理国家，造福天下，哪怕有一个百姓未能受惠，也好像自己把他推入沟中一样。要普济万民，只有宰相能做到。现在签词说我当不了宰相，要实现利泽万民的心愿，莫过于当良医。如果真成为技艺高超的好医生，上可以疗君亲之疾，下可以救贫贱之厄，中能保身长全。身在民间而依旧能利泽苍生的，除了良医，再也没有别的了。”

这就是后世相传“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由来。那些胸怀大志的儒者，把从医作为仅次于做官的人生选择，正是因为医药的社会功能与儒家的经世致用（即治国平天下）思想比较接近。元代戴良说得好：“医以活人为务，与吾儒道最切近。”萧龙友在1928年的弃官从医，正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天下从此少了一个小吏，却多了一名大医。

为袁世凯、孙中山诊病，声名大振

萧龙友治病素以诊断高明而为人所敬重。在医疗上他既全力以赴，却又从不吹嘘。能治者则治，不能治者绝不包揽。他曾为袁世凯、孙中山、梁启超、蒋介石、段祺瑞、吴佩孚等名流看过病，都给予了实事求是的诊治。

1916年，袁世凯58岁。他身体素健，平日食量很大，尤其是喜吃河南烤鸭，每天晚上睡觉前要喝参茸酒一杯。旧中国的士大夫总要摆出一副倚老卖老的姿态，袁世凯也一样，50岁以后见客时就要人搀扶。别人叫他老头子，他则常把“吾老矣”、“衰朽之年”一类的话挂在口头边。袁世凯病时，每天仍在病榻开榻前会议，处理



一切公务，直到病危时，亦不中断，只是改由长子袁克定在榻前襄助。

1916年5月27日晚，萧龙友用过晚饭，正在家中翻看医学典籍，门外传来咚咚咚的敲门声。萧龙友并不觉得奇怪，虽然自己刚从山东济南调进北京任财政、农商部秘书两年，但他懂中医、会看病的名声早已不胫而走，远远近近的官员百姓有个头痛脑热的都来找他。他从敲门声中听出患者肯定病得不轻。果然，家仆很快慌慌张张跑了进来：“萧爷，来说袁大头请您瞧病去。”袁大头就是袁世凯，半年前宣布称帝，83天后又被迫取消帝制，皇帝瘾没过足，反倒折腾出一身病来。萧龙友和中医刘竺笙、驻京法国公使馆医官博士卜西京已经为他瞧过好几回病了。

萧龙友对袁世凯没有好感，但作为一名医生，治病救人是他的天职。所以他很快穿戴整齐，坐上轿子来到袁世凯住所。这时老中医刘竺笙已经早来一步了。刘竺笙号完脉退到一旁，由萧龙友接着号。随后，两人退到客厅。刘竺笙说：“方骏兄，我看袁大总统这次凶多吉少啊。”萧龙友说：“大总统患有因膀胱结石导致的尿毒症，这是早就知道的，可是我刚才号脉时发现，大总统恐怕还患有糖尿病，我问了家人，也说他最近口渴胸闷，小便频频，看来是并发症了。”说着，萧龙友提笔开了一个处方，又在另一张纸上写下这么几行字交给管家，上面写的是：“得病之时，口渴胸闷，小便频频，身体日渐羸瘦，针药罔效。”意思就是说，袁大总统得的这病打针吃药恐怕已无济于事了，准备后事吧。管家当然不死心，又请来一些江湖郎中，开了不少药，乱吃一气，结果毫无起色。6月4日，请来西医卜西京又打针吃药，诊治了一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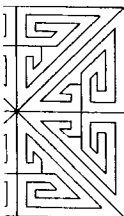
6月6日清晨3时，袁世凯终于断了气。死后发表的《政府公报》只说袁世凯是死于尿毒症。有好事者把袁世凯自称帝以至失败而死的一幕丑剧戏作挽联一幅：“病起六君子（此指洪宪六君子为

祸首)；命送二陈汤！”“二陈汤”本是中药的药名，这里的“二陈”指陈宦和陈树藩，“汤”指汤芑铭。由于袁世凯病倒时，正遇陕西陈树藩、四川陈宦、湖南汤芑铭先后来电独立，说明袁世凯绝非仅仅死于生理之病，还有心理上的煎熬。

1924年11月，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的计划落空。孙先生忧心如焚，到达天津的当天晚上，突发高烧，肝痛剧烈，颓然病倒了。12月31日，他乘坐的专列驶进北京前门车站。由于病情严重，孙中山暂时住进北京饭店，以便治疗。经德国医生主持会诊，认为是肝脓肿，脉搏在每分钟120次以上。然而治疗了十几天，并无好转，反而发现眼睛出现黄疸迹象。看着孙先生不能饮咽的痛苦的样子，孙夫人宋庆龄暗自垂泪，托人四方打探，希望能请一个能起死回生的名中医为孙先生诊治。就是在这个时候，萧龙友被请到了孙先生的病榻前。

病榻上的孙中山，人消瘦了许多，然而眉宇间依然英气逼人。守在病榻旁的宋庆龄脸上有些憔悴，显然一连几日没有睡好。萧龙友只比孙中山先生小4岁，然而孙中山的赫赫英名早已令他钦仰久矣。他多想尽自己平生所学，为孙先生减轻哪怕是一丝一毫的痛苦。然而为孙先生号过脉之后，他知道自己来晚了。他的诊断结果是孙先生的病根在肝，而且这个病至少已经有10年以上的历史了。萧龙友知道孙中山也是学医出身，没有必要向他隐瞒病情，就如实地告诉了孙夫人。宋庆龄听了，暗暗吃惊，想起孙先生近些年的病症，知道萧先生所言不虚，她忙问：“可有什么灵丹妙药？”萧龙友悲哀地垂下了头：“先生已病入膏肓，不是汤药所能奏功的。”周围有不少人都央求萧龙友开个方子，萧龙友果断地拒绝了。宋庆龄明白了这一切，她对萧龙友说了声“谢谢”，亲自安排人把他送回家。

1925年1月26日，孙中山被送进协和医院手术室。当医生打开他的腹腔时，惊讶地发现“肝部坚硬如木，生有恶瘤”，立即取出



活体标本进行化验，结论是肝癌。协和医院院长刘瑞恒是孙中山的好友，他断定孙先生为肝癌最末时期，已无生存希望。2月18日，孙中山被送至东城铁狮子胡同5号的临时行辕，在那里度过了他一生的最后时刻。1925年3月12日上午9时30分，孙中山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萧龙友为孙中山诊病不开药方的事情传了出去，人们无不佩服他实事求是的医疗作风。这件事轰动一时，萧龙友的医名进一步流传开来。

有一次，著名维新革命家、做过袁世凯政府司法总长和段祺瑞执政府财政总长的梁启超的夫人生病，梁启超的学生谢国桢就把自己弟弟的岳父萧龙友先生请到了天津。经萧龙友精心诊治，几天之后，梁启超夫人的病就好转了。临行时，谢国桢请示梁启超赠送多少礼金。梁启超提笔一挥，嘱向账房领钱：“礼金大洋二百元整。”谢国桢不禁咋舌：“真是总长的派头！”

1926年3月，梁启超本人因便血腰疼到协和医院诊治，经X光透视显示左肾有黑斑一处，医生诊断结果是左肾患结核，需手术切除。那时梁启超与萧龙友已相交甚笃，经常往来，为慎重起见，特请萧先生复诊。萧龙友为梁启超切脉后，断然否定了协和医院的诊断结果：“肾脏绝无大病！”力劝梁启超切勿草率从事，并为梁启超对症下药，处方诊治。

萧龙友登门诊治两次后，便改为由谢国桢用信详细函告梁的病情，用通信的方式互相联系，然后由萧先生处方对症下药。

服用萧先生开的中药以后，梁启超觉得神清体爽，颇见功效。但是后来，病情又出现反复，病情反复的主要原因是梁先生没有停止读书治学的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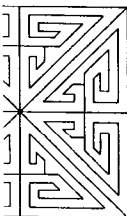
当谢国桢将梁先生的实况函告萧龙友后，萧龙友便复函谢国桢说，梁先生的病要想治好并不难，但不能光靠药力，俗话说“三分

看病七分养”。要想彻底恢复健康，前提是停止劳神费心的工作，读书治学当然是在必禁之列，否则即使是扁鹊再生，华佗降世，也是无能为力的。

萧龙友复函后，满以为学富五车的梁启超能听其劝告，放下书本，配合治疗。没想到，当谢国桢将其意转告梁先生时，梁先生不但不采纳大夫的意见，竟回答说：“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坛。”萧龙友从谢国桢处听到此话后，既佩服梁先生治学的执著，同时也深为先生的病情叹息，深感自己已无可奈何。

时过不久，梁启超的病情果然恶化，立刻送到协和医院准备手术。住院后，梁启超饱受病痛折磨，常常无法忍受，对医院的治疗方案也产生了怀疑和不满。他在给梁思成夫妇的信中这样写道：“这回上协和医院一个大当。他只管医治，不顾及身体的全部，每天两杯泻油，足足灌了十天，把胃口弄倒了。也是我自己不好，因胃口不开，想吃些异味炒饭、腊味饭，乱吃了几顿，弄得肠胃一塌糊涂，以至发烧连日不止。人是瘦到不像样子，精神也很萎顿……”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协和医院匆匆为梁启超实行了手术，手术由院长刘瑞恒亲自主刀，但刘瑞恒判断失误，竟将健康的肾脏切去，而留下了病肾，这是导致梁启超壮年逝世的直接原因。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这位信奉应像死在沙场上的战士一样的大学者，在京与世长辞。对这一重大医疗事故，协和医院一直守口如瓶严格保密，后来为遮人耳目，将事故责任人刘瑞恒调离医院，改任卫生部政务次长。直到几十年后，医学教学在讲授如何从X光片中辨别左右肾时，才举出这一病例，至此梁启超死因真相大白于天下。

萧龙友当年出诊的情况，在文化学者邓云乡的笔下有一段精彩记录。那时老先生岁数已经很大了，行医只出诊，不门诊，出诊费西城八元，东、南、北城路远加倍。要知道，当时协和医院挂号费的特别号是大洋十元，普通号大洋一元。萧先生八元的出诊费是相



当可观的。他乘坐一辆浅咖啡色汽车，车的两个备胎插在水箱的两面，在当时可是很新式的东西。车前面坐两个人，一是司机，一是管事。看完病把礼金交给管事。如果出诊看完一个病人，顺便再给家中其他人诊脉、开个方子，便再加二元。老先生的方子以草药为主，药剂很大，价钱不贵，不大开贵重药，也不指定药店去买。

邓云乡的房东陈同孙的夫人有一次产后虚弱，病情十分危险，好多医生已感到束手无策了，便请来萧龙友先生为之诊脉。经仔细“望闻问切”之后，尚未开药方。这时陈同孙如夫人的堂妹正好放学归来，听说萧龙友先生来看病，便也由母亲陪着，请顺便诊脉，说是月事一两个月没来了。萧龙友先生就又给这位小姐看了一番。全部看完之后，陈同孙把萧龙友先生让到客厅中休息、喝茶、开药方。这时，萧龙友先生看客厅中没有别人，便轻声但很肯定地对陈同孙说：“尊夫人的病，别看十分沉重，包在我身上；如夫人令妹的病，不大好治，恐怕过不了八月节……不过先不要同如夫人说。”陈同孙听了很吃惊，忙问为什么，萧龙友先生回答说：“治疗晚了，现在淤血，药力已经打不开了。”

把萧龙友送出家门以后，陈同孙仍然半信半疑。一个在床上已奄奄一息，倒不要紧；一个尚骑着脚踏车上学，反而十分危险，这如何令人相信？

后来事情的发展验证了萧先生的诊断。萧先生说这话的时候是在端午节前后，不久炎夏来临，学校放暑假。缠绵床褥的夫人经萧龙友先生多次诊治按方服药之后，渐渐好了起来。而那位小姐却在暑假中日渐面黄肌瘦，秋季开学已卧床不起，果然在阴历八月上旬末去世了。

邓云乡的岳父许宝葵有一个内弟姓钱，十二三岁的时候得了一种怪病，气喘吼个不停。许多医生都看不好，请当时德国名医狄伯尔大夫、日本名医小金大夫治疗过，都不见效。从天津回北京的火

车上，其家人幸遇萧龙友先生，谈起此事，萧龙友先生答应回京看看。诊脉之后，开了方子，其中主药是细辛，告诉药要一点一点喂下去。药一下肚，病人就出汗，不安定。病人母亲作主，把药全部给他吃下，一会儿，病人就大吐起来，吐出的全如绿萝卜滓状物，自此病就好了。邓云乡见到钱先生时，已是蹒跚老叟，但身体非常健康。

王会庵先生在《京都人物摭忆》一文中说，据他所知，旧北京时代，许多经东交民巷德国医院克礼大夫治不好的病症，经萧龙友妙手回春的，不在少数。

“不重中医国必危”

1929年国民党政府任命汪精卫为行政院长，于当年2月召开中央第一次卫生委员会议。余云岫等人抛出一项“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提案，其中胡说什么“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新医事业一日不能向上，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等谰言。该项荒谬提案居然被通过，当局随即作出决议“取缔中医”。

这一消息一经传出，立即激起了全国人民和中医药界的极大公愤。全国中医及中医药团体联合起来，表示坚决抗议。各界代表聚集上海，于3月17日召开临时大会。会议通过决议，成立了全国医药团体联合会，组织“联合赴京请愿团”。萧龙友因年事已高，南下不便，他便和施今墨等华北中医代表一致推选孔伯华为请愿团临时主席，率领全团成员前往南京请愿，要求政府取消这项决议。

在中国，中医中药毕竟有着深厚而又广博的根源，是国粹，要在一夜之间废除它，显然不会得到广大群众和社会舆论的支持，再加上孔伯华等名医在会上激昂慷慨，据理力争，反动当局鉴于此种形势，被迫收回成命，并同意成立国医馆，中医算是获得了些微的